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演变的文化驱动机制解析

Analysis of Culture-driven Mechanism in Evolution of Ethnic Settlement Landscape

张斌
ZHANG Bin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18)11-0112-05
DOI: 10.14085/j.fjyl.2018.11.0112.05
收稿日期: 2017-07-22
修回日期: 2018-09-15

张斌/1971年生/男/湖北人/博士/华中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教授、副院长/农业农村部华中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文化与遗产保护(武汉430070)
ZHANG Bin, born in 1971 in Hubei Province, Ph.D., is a professor and assistant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e director of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P. R.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landscape culture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Wuhan 430070).

摘要: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作为文化景观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演变实质是文化的变迁。聚落景观演变的文化驱动机制有三:内化机制表现为人对聚落景观的意义认同和范式遵从;外化机制表现为人的意志外化为制度文化并对聚落景观施加影响;涵化机制解释相异文化接触交流的途径以及可能导致文化分离、整合、同化或边缘化的结果。分别对传统的和现代的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演变进行文化解析,提出基于内化机制重构意义系统,基于外化机制优化制度文化和营造真实景观,基于涵化机制弘扬文化自信与自觉,以抵御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现代异化。
关键词: 风景园林;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内化;外化;涵化;异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整合保护导向下的武陵山区传统聚落景观特质区划与个体识别研究”(编号516782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分层级景观特征评估与管护规划研究”(编号2662018YJ017)

Abstract: The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 landscape is a special type of cultural landscape. Evolution of ethnic settlement landscap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ultural change, whose drive mechanisms include intern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The internalized mechanism explains human's meaning identification and paradigm conformity to settlement landscape. Volition is always expressed as the regimes or stipulations of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the externalized mechanism. The acculturation mechanism can result in four different ways: cultural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Thus,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thnic settlement landscape, the strategies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the meaning systems, optimizing the regimes and developing real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awareness are put forward to resist the modern alien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this paper.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 landscape; intern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acculturation; alienation

Fund Item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Landscape Character Zoning and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under Integrated Protection Guiding" (No. 51678269);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Hierarchical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Rural Area under the Targe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ase of Hubei Province" (No. 2662018YJ017)

历史上各民族(族群)世代聚族而居,与其赖以生活的环境共同作用,积淀形成各具特色的聚落景观,维系着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聚落景观在近数十年里逐渐加速异变,总体上朝现代同质化演进。

特色退化是全球景观变化的共性问题,其诱因存在于多个方面^[1-2]。针对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演变的研究发现,四川阿坝藏族聚落景观主要受自然、族群历史、社会组织影响^[3],而甘南藏区更多受宗教文化、家庭生活水平等影响^[4];

宁夏南部回族聚落景观主要受人地关系、宗教文化和政策制度等影响^[5]；呼伦贝尔蒙古族聚落景观主要受自然、生活方式、人口、风俗、政策等影响^[6]；黔东南苗族聚落景观受自然环境、自然崇拜和风水等影响^[7]；广西壮族聚落景观主要受自然、生产条件、风水、宗法等影响^[8]；云南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主要受自然、经济、政治和建筑技术等影响^[9]。基于区域尺度的研究发现，对西南聚落形态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土地文化^[10]；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因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家族制度、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11]。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在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同景观演变的文化驱动力及其作用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超越具体情况寻找普遍模式^[12]，从对具体文化驱动因素的研究转向对普遍文化机制的剖析，梳理其演变的共性规律，以供当下和未来发展参考。

1 文化机制概念阐释

聚落是人们按照在理想环境中以理想生活的共有图式进行选择的结果，其中的“图式”（schema）就是文化^[13]。有机演变的聚落景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类型^[14]，其演变实质是文化的变迁，相应的文化机制主要涉及内化/外化机制和涵化机制（图1）。

1.1 内化/外化机制

内化、外化是2种文化心理机制，前者是把社会中的文化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的过程，后者是内在的文化向外在环境的转化^[15]。聚落景观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内化/外化的循环机制：1）主体对某种景观的价值产生认同；2）主体将内在的“图式”投射进聚落环境。

内化机制下，聚落景观的价值取向涉及功能、美学或意义的认同。文化心理学认为意义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16]，建筑现象学认为意义更具“空间和时间恒定性”^[17]，因此意义认同是聚落景观最本质的价值取向。按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的观点^[18]，意义可分为三层： “高层次”意义与宇宙观、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等有关，“中层次”意义与身份、权力、地位等有关，“低层次”意义与日常生活规约有关，三者分别指向精神性、

社会性和生活性。而功能、美学价值取向多表现为对景观形态等具体景观范式的价值认同。总之，人们对景观的意义认同和范式遵从是维系聚落景观稳定的基础，三者统一的格局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新的意义和范式追求，导致聚落景观演变。

外化机制下，主体的内在“图式”不直接投射在聚落景观中，而是首先外化为主体的意志，再转化成客体的制度文化（各类制度律法及礼仪俗规）^[19]，最终对景观演变构成影响。主体意志是外化的先决要素，理论上人们可以自由建造住屋，但必须尊重邻里，服从地方礼俗和规章，因此个体意志通常遵从地方（群体）意志和权力（政府）意志。意志转化形成2类制度文化，其中权力意志通常转化成正式制度，地方意志通常转化成非正式制度，二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分别作用于聚落景观的演变。

1.2 涵化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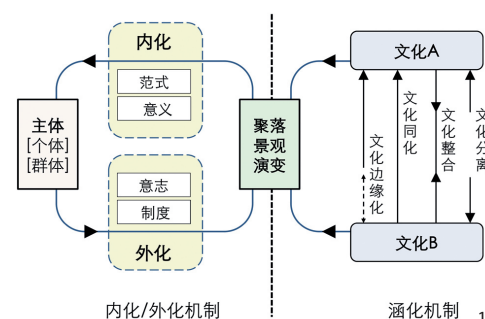
涵化理论是文化传播论解释文化变迁途径的基本理论。所谓涵化，是不同文化相互接触造成一方或多方发生变革的文化机制^[20]。涵化导致不同变迁结果：一方坚持自身的原有文化，并有意回避与其他文化接触，形成文化分离；保持其原有文化，但又不得不与异文化接触，可能会出现文化整合；出于自愿选择或被强制而放弃其原有文化，而与另一文化密切接触，则可能发生文化同化；既不能充分保持原有文化，又不能融入异文化中，则会出现文化边缘化^[21]。涵化机制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解释相异文化接触、交流对聚落景观演变的驱动机制。

2 内化——景观意义认同与范式遵从

2.1 传统聚落景观的意义与范式具有系统化、多元化特点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环境中点点滴滴的事物也都为人所熟悉，且充满意义”^[22]。

“高层次”意义旨在为聚落建立“精神庇护”。如伊斯兰聚落的圣礼清真寺常常位于聚落中央，通过中心位置、朝向和体量来标示其核心地位^[23]。藏族聚落的中心佛寺与尘世保持距离，通过偏处一隅、靠近神山或踞于高处来标示其极核地位^[24]。同样拥有佛



1 聚落景观演变的文化驱动机制图解

Diagram of culture-driven mechanism of settlement landscape evolution

寺的傣族聚落，其空间极核不是佛寺，而是聚落中的“寨心”^[25]。“风水”思想影响下的聚落，依据地脉确定庇护族群的空间格局。在传统聚落中，“高层次”意义极为重要，通常由少数精神领袖解释，并在族群内传播、强化，从而建立起共同的意义认同。

“中层次”意义旨在建立等级秩序和礼制伦序，主要通过聚落空间分化实现其意义的社会教化。如宗教聚落中，社会地位高的种姓家族居住在靠近宗教中心的区域。在宗族聚落中，族长家庭的宅屋通常靠近祠堂。在城镇聚落中，权贵、富豪占据好的位置和更大的地盘。在房屋分配上，长者、尊者住正房、上房，晚辈住厢房或耳房等。

“低层次”意义主要是信仰文化、族群社规等在日常生活生产中的表达，旨在实现生活教化。少数民族的多元崇信，促使族群将聚居环境内化为神性或灵性场所，并主动维护其自然与人文景观。集体认同的乡约族规引导聚落空间秩序，维系生活伦序和族群稳定。约定俗成的仪式和活动则更多营造出鲜活风情和精神快乐^①。

在没有与异文化发生涵化的情况下，聚落环境和聚居生活叠加形成的景观范式被世代遵从，精神性、社会性和生活性的意义互补，并经由住民内化形成景观意义的集体认同，这是传统聚落景观得以长期维系的根本。

2.2 现代聚落景观的意义与范式发生异化

进入现代社会，民族聚落景观传统的意义系统逐渐“礼崩乐散”，总体表现为精神性

的“高层次”意义退后，社会性和生活性的中、低层次意义扩张。

现代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和技术理性，剥离了人和环境的密切关系。除部分保存民族宗教信仰的地区外，“高层次”意义在现代聚落中已基本不存，民族聚落的自然环境逐渐褪去了灵性，化为被攫取和利用的资源，或成为旅游者猎奇的对象。聚落环境只是栖居之所，难以成为精神家园。

“中层次”意义中，代表权力、地位和身份的景观不再是文化精神场所，而是象征权力和资本的现代构筑。由此，传统地景被视为“落后”，“高大洋”景观成为追捧的范式。总体上，“中层次”意义异化泛滥，并日益取代“高层次”意义的主导地位，促成“乡村仿城镇、小城学大城、大城寻乡愁”的怪圈。

“低层次”意义在现代民族聚落中没有萎缩，但发生了异化。昔日世代传承和生效用的“伦序、风水”等范式被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所取代，人们对聚落公共景观的主动关照越来越少，私有景观的意义远大于公共景观。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精神的公共仪式活动，被同质的消费化、时尚化活动所取代，甚者沦为商业“表演”^[26]。景观的生活性意义逐渐失去“方言表达”。

3 外化——制度文化对聚落景观的影响

3.1 传统聚落景观的制度文化表达

传统农业社会中，制度文化在宏观、微观2个空间尺度上对聚落景观施加影响。

宏观层面，权力意志通过官方法规等正式制度，在聚落格局空间分异上实现权力表达，地方意志通过非正式制度，促使聚落分布形成社会自然结构。羁縻、土司制度时代，土司阶层的意志构成正式制度，决定着族群聚落空间格局。“改土归流”后，土司阶层被逐渐取缔，土司辖区被渐次纳入国家空间结构中，新的流官政权组织代表国家意志，影响和控制着城镇聚落的空间格局；在非正式制度文化下，“改土归流”前各族群聚落的空间结构主要取决于族群间的武力竞争，族群聚居空间随之扩张或萎缩。“改土归流”后聚落空间结构趋于稳定，并逐渐形成经济

结构上的区系等级^②，民间贸易交流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对聚落群体空间地理结构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

微观层面，制度文化影响传统聚落景观的形态及空间秩序。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正式制度，要求聚落形态严格按礼制规约进行标准固化，而以《管子·乘马》思想为代表的先验经验^[27]和“风水”理论，提倡因地制宜的聚落布局，表现出强烈的非正式制度色彩。2种制度文化在聚落营建过程中协同外化，使聚落形成规则的或自然的形态；聚居空间秩序方面，“改土归流”前正式制度主要取决于土司阶层的权力意志，部分土司甚至对住屋形式型制都加以严格限定^③。“改土归流”后，一方面，父权家长制的意志外化成正式制度，从宫城、衙署到宅邸，莫不严格遵从尊卑伦序的空间规范，形成“家国同构”的主流文化景观范式。另一方面，大量民居聚落则因宗教信仰、材料工艺等差异，更多遵从地方非正式制度而形成千姿百态的聚落景观。

3.2 现代聚落景观的制度文化表达

现代制度文化总体上导致聚落无序生长。世俗文化取代神圣文化，对利益的追求逐渐成为聚落发展的最大动力，国家和地方政府法规等正式制度日益成为唯一制度文化。资本和行政意志主导的景观恣意增生，一类是盲目植入流行文化，典型者如一些援藏的现代风格建筑，吴良镛院士批评其“与地方文化格格不入”^[28]；另一类则是打着“复兴文化”的旗号，通过行政意志营造“仿古街”“文化村”“主题园”等，对民族地域景观造成建设性破坏^[29]。总体上，法规政策和官方规划等正式制度文化对聚落景观的约束大于引导、干涉多于顺应，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文化则被摒弃，或被严重压缩至边缘化。制度文化的内涵及作用方式改变，使得维系聚落的传统文化秩序不再可靠，大部分聚落的历史空间边界被突破，空间形态被解构，传统聚落景观解体，景观特色逐渐模糊而趋向均质。

4 涵化——景观理想图式的交流与嬗变

4.1 传统聚落景观的多向涵化

传统民族聚落景观早期表现的文化分离，

即保守既有文化，对异文化接触保持警惕。

“彝族不住深谷，白族不上高山”，属于主动分离。武陵地区的“汉不入峒，蛮不出境”、台湾地区的“汉番分界”^[30]，则是国家意志下的强制分离。正是这些主动或被动的分离，造就了聚落景观原型多样性，即使历经沧桑，其不同文化线索至今仍然能被甄别。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文化分离只是阶段性形态，一旦与异文化接触的程度够大、频度够高，就可能形成文化整合或同化。近数百年里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受汉文化影响至广至深。西南诸民族历史上多以采猎或刀耕火种为生，在官方强制推行和汉族移民共同促动下，逐渐接受了汉族农业技术的同化，大规模垦荒造田，导致自然景观深度改写，造成普遍性水土流失^[31]，但也造就了以云南元阳梯田为代表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2]。聚落空间形态和建筑景观方面，州府县城的城池、衙署、文庙等官方建筑常常构成聚落控制性景观，其布局和建制严格遵从国家规范，属于文化同化。而因移民迁徙、商业往来形成的馆堂庙祠等地标景观，虽有汉文化基因，但建造工艺多融入地方文化，是文化整合的结果。土家族吊脚楼的建筑组合全面吸收了中原北方院落的格局范式，一般民房的正房居中，两（单）侧厢房因坡地构成“双（单）吊”的吊脚楼（图2），属于典型的文化整合。

此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涵化也促成了聚落景观变化。佛教在传入盛行苯教的藏族地区之后，“融苯归佛，反客为主”^[33]，表达终极关怀的中心佛寺体量高大且远离尘世，主导精神世界，而弘扬苯教的庙祠、场所则散布聚落，关怀现实生活。地理空间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多是单向流动，小族群融入文化相异的大族群后，遵从后者的景观范式。如生活在藏区的门巴族、珞巴族等大都认同藏族景观范式，其住屋形式多是藏式风格。要之，弱势一方主动或被动接受涵化，一经文化整合或同化，旧的范式和意义即被扬弃。数千年不断的民族迁徙和文化流动，促成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34]，直至工业社会前期，各“小聚居”的传统聚落景观仍然清晰可辨。



2 土家族吊脚楼（双吊）吸收了汉族正房、厢房的空间布局范式
The spatial layout paradigm of the main room and wing room of Han nationality is absorbed by stilted buildings (double stilts) of Tujia nationality

4.2 现代聚落景观的单向涵化

进入现代社会，聚落景观的文化涵化不再纠缠于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文化角力，更多面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流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分离已基本不存在，拥抱现代化的文化整合和文化同化正在蔓延。蔓延的前端是发达地区，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处在蔓延的后端。受到现代化的全面冲击，诸多少数民族对原有文化逐渐失去自信，一方面急于向现代文化靠拢，简单抄袭、杂乱拼贴现代景观，另一方面又缺少把控现代文化的能力和条件，缺乏对本土地域和民族自身文化的自觉，仅存的地方性、民族性景观逐渐式微，呈现为文化迷失和文化边缘化。现代文化主流的积极性毋庸置疑，但其对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异变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见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传统农业社会中，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高、中、低3层意义互补，多维的教化与传播不断促使族群内化形成集体认同，是聚落景观得以长期维系的根本；正式制度促成了聚落景观在格局和规制等方面的规范统一，但不同民族、地域的非正式制度纷繁多样，充分维系了聚落景观的多样性；历史上空间相邻的各民族间文化持续涵化，汉文化发挥了全面影响作用但止于文化整合。总体上，各民族（族群）的聚落景观特色清晰可辨。

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高层次意义显著退后，中、低层次意义异化扩张，聚落景观的意义被现代、世俗的价值取向所牵引，景观范式改写频繁；国家和地方政府法规等正式制度日益成为唯一制度文化，地方意志下的非正式制度被高度压缩，传统景观加速解体，朝现代同质化发展；少数民族间的涵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体面向

现代化、全球化的文化整合和文化同化。

5.2 讨论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是始终处在有机演进过程，亟需科学合理地保护景观资源^[35]，对业已异变的聚落景观，需要探寻有生命力的文化策略，积淀其被削薄了的文化厚度，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④的聚落景观。

需要重视内化机制的作用，促进各民族（族群）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省与自觉，积极重构景观的意义系统：“高层次”意义应恢复对自然环境的敬畏，认同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现代栖居意义^[36]；“中层次”意义需要抵制资本的狂妄，彰显公共景观的价值；“低层次”意义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地方的、民族的景观范式。

发挥外化机制的积极作用，除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科学的法规以外，亟需地方的和民间集体的力量，构建和运作非正式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新“合力”，指导并推动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传承和发展本土及民族的特色。

在面向现代化、全球化文化的涵化机制下，需要积极探索适于民族本土景观之路，营造适度、得体的真实景观。尤其需要弘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策略不止适用于少数民族聚落景观。

注释：

- ① 民国时期，刘恩兰调查川西聚落时写道：“读者或以本地区民生缺乏乐趣，实则不然，各部落人民皆天性乐观，习于贫苦，山间时有讴歌，声震河谷，音调自然悦耳，至于情歌对唱，则每为缔姻之前奏。”参考刘恩兰《川西之高山聚落》。
- ② 施坚雅（G. W. Skinner）根据市场辐射区域的边界分析，构造出中国农业社会的5个中心集镇等级，随着层级的向上，中心集镇的数目骤减。参考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
- ③ 如西南土司统治地区规定：“官衙署倚柱雕梁，砖瓦鳞次。百姓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舍把头目许竖梁柱，周以板壁，皆不准盖瓦，违者即治僭越之罪。”参考民国《永顺县志·杂事》卷三十六。
- ④ 引自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
- ⑤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ANTROP M. Sustainable Landscapes: Contradiction, Fiction or Utopia?[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2006, 75(3-4): 187-197.
- [2] 肖遥, 李方正, 李雄. 英国乡村景观变迁中的文化驱动力 [J]. 中国园林, 2015, 31(8): 45-49.
- XIAO Yao, LI Fangzheng, LI Xio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Driving Forces of Rural Landscape in Britain[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5, 31(8): 45-49.
- [3] 酈大方, 金笠铭. 聚落与住居：上中阿坝聚落与藏居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
- LI Dafang, JIN Liming. God Bless Tibetan Dwellings Settlement and Housing[M].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3.
- [4] 成亮. 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模式研究 [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6.
- CHENG Liang. Gannan Tibetan Rural Settlement Space Model Research[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 [5] 马冬梅, 陈晓键, 燕宁娜. 青海固原族聚居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干旱区资

源与环境, 2016, 30 (4): 1-7.

MA Dongmei, CHEN Xiaojian, YAN Ningna.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slim Settlements in Xihaigu Region of Ningxia[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30(4): 1-7.

[6] 康美. 呼伦贝尔草原聚落空间特征研究: 以新巴尔虎左旗为例 [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6.

KANG Mei.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 Space in Hulun Buir Grassland, the Left of Xinbaerhu as an Example[D]. Hohho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6.

[7] 王乐君. 黔东南苗族聚落景观历史与发展探究 [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WANG Lejun.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Qiongnan Miao Settlem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4.

[8] 赵冶. 广西壮族传统聚落及民居研究 [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ZHAO Zhi. The Research of Guangxi Traditional Zhuang Villages and Residences[D].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2.

[9] 王莉莉. 云南民族聚落空间解析 [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0.

WANG Lili. Space Analysis on the Yunnan Nationality Settlements, Take Three Villages for Example[D]. Wuhan: Wuhan University, 2010.

[10] 李建华. 西南聚落形态的文化学诠释 [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1.

LI Jianhua.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uthwest Settlement Patterns[D].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2011.

[11] 管彦波. 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21 (2): 94-99.

GUAN Yanbo. 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ttlement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1, 21(2): 94-99.

[12] SKOKANOVÁ H, FAL AN V, HAVLÍ EK M. Driving Forces of Main Landscape Change Processes from Past 200 Years in Central Europe-differences Between Old Democratic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J]. Ekológia (Bratislava), 2016, 35(1): 50-65.

[13] 阿摩斯·拉普卜特. 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 [M]. 常青, 张昕, 张鹏,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RAPOPORT A. 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M]. CHANG Qing, ZHANG Xin, ZHANG Peng,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4.

[14]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EB/OL]. (2017-07-12) [2018-10-10]. <http://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15] ZITOUN T, GILLESPIE A. Internalization: How Culture Becomes Mind[J]. Culture & Psychology, 2015, 21(4): 477-491.

[16] MACKAY N. Psychotherapy and the Idea of Meaning[J]. Theory & Psychology, 2003, 13(3): 365.

[17] 诺伯格·舒尔茨. 西方建筑的意义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NORBERG-SCHULZ C. Meaning in Western Architecture[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5.

[18] 阿摩斯·拉普卜特. 建成环境的意义: 非言语表达方法 [M]. 黄兰谷,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RAPOPORT A. The Meaning of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M]. HUANG Gula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4.

[19] 孔庆明. 黑格尔法哲学要义简析 [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4 (1): 22-35.

KONG Qingming.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Main Ideas About Law in Hegel's Philosophy[J].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1, 14(1): 22-35.

[20] 王铭铭. 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 [J]. 民俗研究, 1998 (1): 1-14.

WANG Mingming. Culture Change and Modernity[J]. Folklore Studies, 1998(1): 1-14.

[21] BERRY J W.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5(29): 697-712.

[22] 诺伯格·舒尔茨. 场所精神: 迈向建筑现象学 [M]. 施植明,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168.

NORBERG-SCHULZ C.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M]. SHI Zhiming, translation.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 168.

[23] 陶金, 张杰, 刘业成, 等. 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宗教习俗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探析 [J]. 规划师, 2012 (10): 93-95.

TAO Jin, ZHANG Jie, LIU Yecheng, et al. Traditional Islamic Customs and Built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Analysis[J]. Planners, 2012(10): 93-95.

[24] 郦大方, 杜凡丁, 李林梅. 丹巴县藏族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构成 [J]. 风景园林, 2013 (1): 110-117.

LI Dafang, DU Fanding, LI Linmei. Space Compositi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Settlements Space in Danba[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3(1): 110-117.

[25] 王晓帆. 神圣与世俗: 宗教观念下的云南傣族聚落变迁 [J]. 华中建筑, 2006 (11): 283-285.

WANG Xiaofan. Sacred and Profane: Habitatlpln Transformation of Yunnan Dais with Religion Concept[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06(11): 283-285.

[26] 单长华. 江西婺源民俗表演醉游人 [EB/OL]. (2011-10-05) [2018-10-10]. http://news.cnr.cn/gnxw/201110/t20111005_508579446.shtml.

SHAN Changhua. Visitors Are Enchant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Ancestor Worship in Wuyuan, Jiangxi[EB/OL]. (2011-10-05) [2018-10-10]. http://news.cnr.cn/gnxw/201110/t20111005_508579446.shtml.

[27] 沈顺福. 后期墨家形而上学研究 [J]. 管子学刊, 2009 (1): 65-72.

SHEN Shunfu. A Metaphysical Research on Post-mozism[J]. Guan Zi Journal, 2009(1): 65-72.

[28] 吴良镛. 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 为 2007 年 6 月 9 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写 [J]. 城市规划, 2007, 31 (8): 14-18.

WU Liangyo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Creation Fo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Day on June 9, 2007[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7, 31(8): 14-18.

[29] 阮仪三, 李红艳. 真实性视角下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 [J]. 华中建筑, 2008, 26 (4): 144-148.

RUAN Yisan, LI Hongy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from View of Authenticity[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08, 26(4): 144-148.

[30] 承上. 台湾山地保留地发展概况 [J]. 台湾研究集刊, 1985 (4): 114-117.

CHENG Shang.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ountain Reserves[J]. Taiwan Research Quarterly, 1985(4): 114-117.

[31] 张芳. 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 [J]. 中国农史, 1998 (2): 50-61.

ZHANG Fang. Soil Eros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 in Qing Dynasty[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1998(2): 50-61.

[32] 张雪葳, 庄子莹, 钱云. 哈尼族传统聚落“垂直循环”特征解析与规划对策研究 [J]. 风景园林, 2015 (8): 37-43.

ZHANG Xuewei, ZHUANG Ziyang, QIAN Yun. The Study on the Vertical Circulation of Hani People Settlement System and Its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5(8): 37-43.

[33] 班班多杰. 佛教在藏地与汉地本土化历史之再考察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12): 157-178.

PALPAR DODORGE. Revisiting the Localization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ibetan and Han Area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12): 157-178.

[34]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FEI Xiaotong.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M].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99.

[35] 张斌. 少数民族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策略反思 [J]. 中国园林, 2010 (12): 33-35.

ZHANG Bin. The Reflection on Spatial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0(12): 33-35.

[36] 马丁·海德格尔. 依于本源而居: 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0.

HEIDEGGER M. Dwelling Near the Origin[M].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10.

(编辑 / 陈汪丹)